

论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基本理路

李泉鹰

摘 要: 高等教育问题不能在产生它的环境中自然地得到解决,它不仅依赖于高等教育实践的改革,同时也有赖于高等教育理论的创新。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与高等教育实践改革是互为生成的,前者来源于后者,同时又指导后者并为后者而存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不仅存在着实践改革乏力的问题,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创新贫血的困境,而后者比前者更为严重。因此,如何求得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重大突破,引领高等教育实践改革突出重围,是一个必须探究和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 高等教育; 实践困境; 理论创新

高等教育问题不能在产生它的环境中自然地得到解决,它不仅依赖于高等教育实践的改革,同时也有赖于高等教育理论的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各种高等教育实践改革频繁,但由于缺乏体现高等教育本真意义和创新张力的高等教育理论为指导,不少高等教育实践改革收效不大,可谓不尽人意。亦即说,由于高等教育理论创新贫血,诸多高等教育实践改革的结果与预期目标相距甚远。因此,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视角出发,求得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与高等教育实践改革的良性互动,探究出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是高等教育研究者和行动者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一、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高等教育理论本身,而是为了引领高等教育改革实践走出困境

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对实践起指导和规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理论本身,而是为了引领实践走出困境、突出重围,即当实践遇到困境与迷惘而实践本身不能解决时,理论必须先于实践而前行,为实践走出困境和迷惘提供新的视野、路径与方法,因为只有与实践进行实质性的对话,才是高等教育理论成立的最充分理由。

高等教育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社会活动,高等教育研究的真正动因绝不是研究者为了追求“闲逸的好奇”,而在于引领高等教育实践走出困境和迷惘。这也是判定高等教育理论到底有无创新品质和创新张力的重要标准。遗憾的是,时下的诸多高等教育研究尚缺乏这种引领高等教育实践脱离困境的纯正动机,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成果与高等教育的实践需求相距甚远,失去了应有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因此,高等教育研究理应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时刻关注变化着的实践呈现出来的各种新问题,在发现与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总结新经验,揭示新规律,从而不断推动理论发展,而不是用现有的理论去解读和迎合实践。同时,不断将理论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当发现理论成果的某些方面不能适应实践的需要时,要及时对其进行补充、修改乃至摒弃,使之更加接近实际与真理。

诚然,强调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实践之间的互为生成性,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理论对高等教育实践的依赖是绝对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理论有时可以超前于实践,或者说某些重大的理论创新或理论发现并不一定完全出自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有时也可以出自人类社会中某一个体或群体

的理性思考。因此,在探索高等教育理论的有效路径上,过分执着于理论与实践的依存关系,认为不按照理论源于实践的轨道运行,就不可能有理论发现和理论创新,也是不客观的。

二、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既要继承人类已有的教育文明成果,也要敢于冲破传统教育理念的樊篱,在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双向互动中萌生新的生长点

一切高等教育理论都植根于其所处的时代,一切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都以继承已有的成果为基础,并在继承中实现超越和创新。事实上,也只有不断深化已有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以前人的成果作为理论创新的起点,对其进行合理的借鉴、反省和批判,才能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离开了本国的文化背景、民族传统,离开了对已有正确理论的继承,高等教育理论创新就失去了应有的根基和条件。诚然,仅有继承是不够的,高等教育理论还必须冲破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及时回应时代需要,服务于社会实践。如果一种高等教育理论固守陈旧的教育观念而缺乏时代性和现实性,那么它就称不上创新性的高等教育理论。因此,高等教育研究者必须时刻关注社会的发展变化,紧紧抓住高等教育中现实课题,切实把对高等教育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作为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重点。简而言之,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既要继承人类的一切教育文明成果,也要敢于冲破传统教育理念的樊篱,在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双向互动中萌生新的生长点。

19世纪中叶以前,人们对高等教育活动的界定以及大学自身对价值的追求,都是以知识理性为根基,都源于传授知识和创造知识这一文化和精神内核,很少赋予高等教育和大学以实践理性。大学对传统理念的固守,虽然维持了高等教育的神圣性,使大学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家园,但也降低了高等教育与大学的社会价值,延缓了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反,那些敢于冲破传统教育观念束缚的大学,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得到了快速发展。以美国为例,19世纪中叶以威斯康星大学和康乃尔大学为代表的新大学,要求知识“下嫁”,率先使大学和知识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生活,“威斯康星思想”和“康乃尔思想”成为一种新的大学理念,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之相反,那些恪守传统大学理念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或者相对缓慢,或者开始从顶峰走下坡路。以英国为例,作为世界最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国家,

英国是当时世界的高等教育中心, 高等教育水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尤其是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学府, 是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水平的最高象征。但是, 由于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代表的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对现代科学尤其是技术的排斥, 大学与英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分离与断裂, 而在英国的“新大学运动”中诞生的新的高等教育机构, 由于无法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相抗衡而始终不能成为英国高等教育的主流, 最终走向与牛津、剑桥等传统大学“合流”的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导致了英国科学技术对本国经济发展和世界影响力的下降, 也导致了英国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影响力的下降。当然, 冲破传统教育理念的樊篱, 并非意味着对传统教育理念的全盘否定, 新的高等教育理论与经典的高等教育理论不是先天排斥和非此即彼的, 新的高等教育理论没必要也不可能替代或完全改变经典的高等教育理论, 它们可以共存于同一高等教育体系之中, 但新的高等教育理论无疑可以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三、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不可闭关自守, 要有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 善于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成果

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 有高等教育理论强势国家, 也有高等教育理论弱势国家, 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应该学会如何吸收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理论的合理内核, 进而更便捷地实现本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诚然, 引进与借鉴外国的高等教育理论, 从中获取有益的养分, 是一国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但它绝不是唯一的途径, 更不是最好的途径。因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 高等教育理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 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必然具有特定的文化与历史色彩, 也印刻着特定的思维模式, 任何一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简单移植到其他国家, 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 当我们引进外国高等教育理论时, 必须有一个选择、反省、批判和改造的过程, 否则引进的高等教育理论最终将因不适合本土的高等教育实践而丧失其理论价值。如果理论输入国对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缺乏一种谨慎的和理性的鉴别与选择, 一些业已证明欠科学甚至错误的高等教育理论, 也可能被理论输入国再次选择, 如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乃至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 都经历过一个被动选择和模仿的过程, 这种被动选择和模仿的痕迹至今依然还在。建国初期, 由于高等教育的主导性和选择性被限制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 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近乎完全照搬前苏联的高等教育理论, 选择的自主性严重缺失, 模仿更是超越了常规意义上的模仿范畴。上个世纪 80 年代起, 我国开始转而向美国学习, 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改革中的许多做法均以美国为蓝本, 但这种近乎模仿的学习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 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拥有不同的文化根基和教育传统, 对美国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的模仿或移植, 只能产生“南桔北枳”的局面。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 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并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的强势国家, 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主动学习其他国家的过程。没有对英国和德国的大学组织体系和办学理念的吸取和借鉴, 就不可能

能有今天美国高等教育的繁荣与进步。

借鉴外国的高等教育理论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理论输入国除了对输入理论进行重新检验和适当改造之外, 还应全面了解所输入或所借鉴理论的背景、本质、功能和限制, 否则最终难免出现“东施效颦”的笑话。今天,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在我国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原本是揭示高等教育在规模扩张中所带来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活动的若干变化, 关于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普及化教育三个阶段毛入学率的具体划分并没有实质的意义和任何统计学上的意义, 完全是理论创始者的一种想象与推测。在西方国家, 自该理论提出以来, 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给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列出一个严格的时间表, 高等教育大众化完全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则是一个“人为”的过程, 是政府“推动”下的程式化过程; 西方国家把大众化理论看成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预警理论”, 我国把大众化理论当成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理论”, 15%的毛入学率在“十五”期间不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也具有“政治学”上的意义。当然,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纯目标化处理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国国情, 但这种目标化的过程中丢弃其预警意义是对原有理论的误读和化简, 更谈不上理论的创新。

四、高等教育理论创新需要解决高等教育特殊性问题, 从问题与矛盾的消解中获取创新的灵感

高等教育理论为高等教育实践而存在, 倘若某一高等教育理论根本不关注和直面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真问题, 那么无论我们对它多么钟爱, 也无论它以何种看似科学和严谨的逻辑、术语、方法和概念体系作为支撑, 都属于诠释性的和概念性的高等教育理论, 都将是一种贫血的高等教育理论, 对鲜活的高等教育实践都将是苍白无力的。假如这种高等教育理论的贫血与高等教育实践的僵化形成互动, 那么该国的高等教育将难以走出困境和突出重围。

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 因而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理应立足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 直面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特殊问题。否则, 高等教育理论将因游离于高等教育实践之外而使其价值和作用大打折扣。从学理上讲, 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都有其独有的制度性根基和教育传统, 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绝不可直接照搬或简单移植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 而应从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出发, 创新高等教育理论。以私立高等教育为例,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我国始终把私立高等教育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 不承认私立高等教育的合法性, 国家政策体系也很难为私立高等教育提供一个与公立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制度空间。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私立高等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提供了条件, 但早期的私立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以捐资办学的形式出现的。今天,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 私立高等教育已普遍以投资办学的形式出现, 私立大学在性质上业已发生裂变, 尤其是在西方国家, 以投资为主的私立大学逐步演变成营利性大学, 而那些非营利性大学在性质上与公立大学越来越接近, 同样可以获得政府的财政资助。我国虽没有对私立大学进行营利性大学与非营利性大学的区分, 但投资办学已成为

私立高等教育的主要办学形式,这种办学形式的转变再次使私立大学的合法性遭到质疑。从私立高等教育的地位看,国外的私立大学往往拥有国家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是整个高等教育的龙头,统领着整个精英教育,占领着学术发展的制高点。我国恰恰相反,公立大学垄断着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是整个高等教育的主体,统领着整个精英教育,私立大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仅仅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补充”。私立高等教育制度性根基与传统的不同,决定着主体不同的价值选择,同时也决定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都难以简单模仿西方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又如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问题,西方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自生秩序”,主要通过竞争自主产生,而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主要靠政府行政力量来推动,所谓“211工程”和“985工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都是国家和政府主导下的教育行为。因此,当我们向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寻求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依据时,发现这些在西方国家业已证明正确的理论,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中却难以找到适用的和生存的空间。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根基和传统与西方不同,西方的高等教育理论一到中国,其合法性基础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理论的普适性和实践的有效性自然也就发生相应的变化。

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存在其特殊性问题,而且现有的高等教育理论往往不足以很好地、甚至无法解答或解释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从本质上看,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是高等教育理论与社会环境双向选择的结果,选择的动力既有来自外部的社会力量,也有来自高等教育自身变革需要的刺激。与过去相比,今天的高等教育已不再是社会发展的被动适应者,业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引领者,能否解决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特殊问题,适应并超越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为高等教育实践乃至社会发展需要提供一个富有前瞻性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性框架,是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基本目标。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广西民族大学副研究员,福建厦门 361005)

参考文献

- [1] 王振武.开放的选择:选择学引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0.
- [2] [美]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刘 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 [3] 邢贲思.哲学前沿问题述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5] 邬大光.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6] 杨 进.基于本土的教育理论原创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5).
- [7] 黄国光.社会科学的理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论研究生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林喜庆
许放

摘 要: 从国家创新体系的内部结构入手,论述了研究生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各个子系统即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 研究生教育;国家创新体系;作用

“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由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弗里曼于1987年在其出版的《技术与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首次提出和使用,后被经合组织(OECD)接受,并在1996年的年度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给予定义:“国家创新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改造和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体系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1]

在国家创新体系的范畴中,研究生教育只是一个范围极小的概念,因为它仅仅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然而,研究生教育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研究生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现代研究生教育最为本质的两大特征,一是在培养方式上,科研与教学相结合,重点是科研活动;二是在办学目标上,既要培养高水平科研人才,又要创造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科研活动、高层次科研人才、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都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石,研究生教育也因此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最重要、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原动力之一。

那么,具体来讲,研究生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笔者试从国家创新体系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现在一般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可分为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4个子系统。“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知识传播系统培养和输送高素质人才,知识应用促使科学知识和

* 本文系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课题“研究生教育、大学科研和国家创新体系”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我国,参与研究生教育培养的单位有四个系统:一是高等学校系统,二是科研机构系统,三是军队系统,四是党校系统。而其中的主力军应该说是高校系统与国立科研机构。本文中,有关数据主要以高校为例。